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袁宏道与 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研究

戴红贤 著

武 汉 大 学 学 术 丛 书

Academic Libra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袁宏道与

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研究

武
汉
大
学
学
术
丛
书

Academic Library

戴红贤 著

Wuhan Universit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宏道与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研究/戴红贤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11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ISBN 978-7-307-10276-7

I. 袁… II. 戴… III. ①袁宏道(1568 ~ 1610)—文学思想—研究
②中国文学—文学思想史—研究—明代 IV. ①K825.6 ②I20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0584 号

责任编辑: 胡程立

责任校对: 黄添生

版式设计: 支 笛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湖北金海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32.75 字数: 465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0276-7/K · 598 定价: 72.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言

袁宏道是公安派的旗手，也是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的主要引领者和强有力的推手。学者们研究袁宏道，必然会涉及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研究晚明性灵文学思潮，也肯定要涉及袁宏道。当然，研究对象不同，涉及的问题亦不尽相同，即使问题相同，但考察的重点和攻克的难点也不一样。

大凡研究袁宏道，学者们都会特别关注他所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革新主张。研究这一主张，有从袁宏道的文学史观和这一主张的针对性入手的。宏道说过：“文之不能不古而今者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雪涛阁集序》）“古之不能为今者也，势也。……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与江进之》）“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选》病‘唐’，不‘汉、魏’病《选》，不《三百篇》病‘汉’，不结绳、鸟迹病《三百篇》耶？果然，反不如一张白纸，诗灯一派，扫土而尽矣。……诗之奇之妙之工之

无所不极，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与丘长孺》）可见，这一主张的提出，是因为他有一古今变化、发展的文学史观，而针对的对象则是当时弥漫诗坛、文坛的拟古之风。

关于宏道革新主张的针对性，最常见的误会，是将复古、拟古混淆不分，以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针对复古而发。其实，宏道乃至整个公安派都不反对意在革新、得其精神而不泥于形迹的复古，他们反对的是复古之弊即拟古以至剽窃古人的恶劣风气。袁宏道明确地说：“夫复古是已，然至以剽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有才者拙于法，因不敢自伸其才，无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智者牵于习，而愚者乐其易，一唱亿和，优人驹子，皆谈雅道。吁！诗至此，抑可羞哉！……余与进之游吴以来，每会必以诗文相励，务矫今代蹈袭之风。”（《雪涛阁序》）“今之作者，见人一语肖物，目为新诗，取古人一二浮滥之语，句规而字矩之，谬谓复古。是迹其法，不迹其胜者也，败之道也。”（《叙竹林集》）宏道揭露、抨击拟古之弊的言论极多，曾借梅子之口说：“诗道之秽，未有如今日者。其高者为格套所缚，如杀翻之鸟，欲飞不得；而其卑者，剽窃影响，若老姬之傅粉。其能独抒己见，信心而言，寄口于腕者，余所见盖无几也。”（《叙梅子马王程稿》）梅子用对比手法说“诗道之秽”，已明显点出性灵说的对立面。而宏道《答李子髯》说：“草昧推何李，闻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后来富文藻，拙理竞修辞。……模拟成俭狭，莽荡取世讥。……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更是对何、李倡导复古，以转变当时萎弱不振的文风有称赞意，唾弃的是“后来”复古不当所引发的“模拟”“莽荡”之弊。

有从文学理论角度入手研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革新意义的。从文学理论上讲，袁宏道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涉及文原论、文用论、文法论、文风论以及文学艺术精神论。其是此非彼的表述方式，表明他以人之性灵为文学的唯一源泉，以抒发性灵为文学的唯一功能，以“受法性灵”为文学艺术技巧的唯一来由，所以他说中道诗文“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

流出，不肯下笔”（《叙小修诗》），一再说“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尔”，“流自性灵者，不期新而新”（江盈科《敝篋集叙》引），且谓“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发、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答李元善》）。宏道论文，尚“质”尚“真”，由此带来看重文风个性化、多元化的倾向。所谓“物之传者必以质，文之不传，非曰不工，质不至也”（《行素园存稿引》）。“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丘长孺》）。其“质”乃本质之“质”，“真”乃性灵之“真”，人的本质、性灵不同，发之为文，自然风格大异。宏道肯定其异，实基于对诗文所写作者本质、性灵之真的肯定。从理论上讲，袁宏道对所有表现作者性灵本真特点的风格取向都持欢迎态度，但他前期有意追求和引以自得的，却是一种以信笔直言、尽情披露、明白简易、快利洒脱为特征的自然朴素的风格。和文风取向密切相关的，是对文学审美特性“新”的向往和追求。当然，他赏爱诗美之“新”，仍是出于对模拟诗风的厌恶，故云：“唐人之诗，无论工不工，第取而读之，其色鲜妍，如且晚脱笔研者。今人之诗即工乎，然句句字字拾人钉短，才离笔研，已似旧诗矣。夫唐人千岁而新，今人脱手而旧，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模拟者所从来异乎！”（江盈科《敝篋集叙》引）而他对待诗文“新”美的审美感受却是深切而又独特的，远远超出了视“新”为构思新颖的认识。后来中道说“盛唐诗品如荔枝”（《答王天根》），郑元勋说隆、万以来小品“芽甲一新，精彩八面”（陈继儒《文娱序》引），颇能道出诗文“新”美清新、鲜活、灵动的特点，不能说和宏道别具只眼的审美视角没有关系。至于性灵说体现的文学艺术精神，简言之，就是在文学作品中不受任何格套、程式束缚，自出心裁地表现自我。受这种艺术精神的影响，文学创作自然要将个人无条件地置于创作的主导地位，使其“性灵”成为诗文表现的唯一对象，即最大胆、最充分地表现真人、真言、真识、真情、真趣，而斥逐假人、假言、假识、假情、假趣于文学之外。一改诗文创作要表现所谓重大主题、关注群体利益、宣扬圣贤之道、融入公共话语体系，以及师法古人、言必有据等传统观念，于颠覆、破坏之中显现其创新意义。使得诗文题材、内容愈来愈个人化、私密化，而书写方式

愈来愈自由化、用语则愈来愈通俗化、口语化。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是明代中叶以来人们愈来愈重视自我价值、愈来愈关注自我人生社会思潮发展的必然，也是明代文学演变趋势所致。

有从宏道思想特色、人生追求的角度入手，研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的。宏道提出的文学口号“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具有高抬自我、张扬自我、维护独立人格、追求精神自由，以及强烈要求表现自我（包括个性、欲望和种种人生感受）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的形成，确实与他的思想特点和追求的人生境界（旁及人生价值、处世态度）密切相关。从思想特色入手考察其人文精神的由来，人们多注意到李贽童心说对宏道性灵说的直接影响。其实，宏道思想受李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最大的影响应该是开放式的思维方式和大无畏的批判精神。前者使之会通众学而对性命之学别具新解，建立起一套直面人生、人性、生命、生活以及自然、社会的认识论；后者使之具有敢于颠覆传统、摆脱束缚、自主创新的勇气，和率性而行、追求自由闲适、快活无量的人生态度。中道说宏道“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心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中郎先生行状》）。亦从思想解放、学风巨变、主体意识觉醒、能动精神焕发、个性充分显露的角度描述宏道所受李贽的影响。而这些对“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观念的形成，无疑会起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从思想特色入手，也有注意到狂禅思想对性灵说张扬自我、否认权威、摆脱一切羁绊观念的影响的。宏道自谓“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唯禅宗一事不敢多让”（《张幼于》），故曾可前说“石公深于禅，故能悟文若诗之指于教外”（《瓶花斋集序》）。其实，宏道不单精通禅宗义理，酷爱谈禅，而且对净土宗和晚明流行的唯识宗心解其义，言之透彻，这些也是促使他能“悟文若诗之指于教外”的原因。所以我们看到其性灵说的一些思想要素、常用术语，不少出自佛经经文，而思维方式尤与佛学相似者多。当然，学者们探索“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人文精神渊源，更多的是从剖析性

灵说和王阳明心学、特别是王学左派后学思想的关系入手。王阳明本来就把“做得个狂者胸次”作为致良知的高层境界，王学左派后学特别是王艮一门（即泰州后学）更“以作用见性”，形成敢于非古骂祖、掀天揭地、非名教所能羁络的狂放思想。这种狂放思想，极端重视自我的个人价值，夸大个人主观意志的力量，既可进入人文精神的理论框架，也能直接外现为狂狷之士为人的特征。宏道受其熏陶，论学、处世、为人远非步趋而已，大有变本加厉之势，当他立志横扫拟古风气，倡导新的诗风、文风之时，其行动原则和具体实践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必然有出自王学左派后学、特别是泰州后学极力突出“吾身”、夸大自我之狂放思想者。

大抵从一个人的人生艺术精神，可以看出一个族群的人文精神；人生艺术精神的形成，多取决于个人的思想修养和独特的生存环境；而文学理论、诗文创作所具有的艺术精神，又取决于个人的人生艺术精神；故探索“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蕴含的人文精神，离不开对宏道人生艺术精神的把握。受传统儒学和释、庄思想以及晚明士风的影响，宏道的人生取向实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功名富贵的向往，一是对自由闲适的追求。关于前者，人们印象不深，因为见他抱怨为令之苦、急欲解脱的文字太多。其实他也对人说过：“自恨才力钝劣，不能建一奇、当一官，百负师门。”（《冯尚书座主》）“弟此时实当出，所以迟回者，实迂懒之故，非真不爱富贵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又曰：‘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将知爱富贵如此之急，而辞爵禄如此之难，弟亦何人，欲作孔子以上人耶？”（《答吴本如仪部》）更何况他几度为官当差，都办事认真、投入，卓有成效，非遁隐山林、绝无仕进之心者可比。关于后者，人们印象颇深，因为他不但说过许多厌弃官场生活的话，有过辞官漫游山林的举动，而且一再宣称要“作人间大自在人”（《龚惟长先生》）。所谓“大自在”，指人生的自由、独立和闲适、快活，即他说的“纵不能骖鸾驾鹤，消摇云海，亦当率行胸怀，极人间之乐。奈何低眉事人，苦牛马之所难，貌妾妇之所羞乎”（《管东溟》）。“率行胸怀，极人间之乐”云云，亦即他说的能享受人间五种“真乐”、“以为自适之极”的“适世一种其人”（《龚惟长先生》）的闲

适、快乐的生活。“奈何”云云，亦即宏道所谓“凤凰不与凡鸟共巢，麒麟不共凡马同枥，大丈夫当独往独来，自舒其逸耳，岂可逐世啼笑，听人穿鼻络首”（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状》）。都说明他有一为人特立独行、自行其是、独抒己见、不受束缚的个性，而其才、学、识、趣、胆、志均有别于人。显然，宏道人生取向的两个层面都曾影响到他文学理论和诗文创作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不过就性灵说而言，影响最深的却是对自由闲适的追求。因为后者体现的人生艺术精神，其实质在于对个性自由的尊重，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自得、自适之趣的追求和对个体生命的珍惜，而这些也正是性灵说人文精神的重要成分。

有联系宏道诗文创作实际研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新意义及其局限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虽然是袁宏道《叙小修诗》提出来的文学主张，但它不仅适用于诗歌创作，也适用于散文创作。事实上，宏道不但在诗歌创作中坚持这一革新主张，散文创作也体现了这一革新思想，而且贯彻这一指导思想所取得的散文创作成就，比诗歌创作成就还要突出、对后世的影响更大。

钱谦益说：“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模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列朝诗集小传》丁集《袁稽勋宏道》）其实，就诗而言，“荡涤模拟涂泽之病”的，除“中郎之论”外，还有伴随其行的诗歌创作。《锦帆集》、《解脱集》中所收作品，即为其遵循“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原则尝试创作的结果。宏道称后者所收诗为“中郎自有之诗”，其“去唐愈远，然愈自得意”（《张幼于》）。又自道其创新之乐，云“近来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世人以诗为诗，未免为诗苦，弟以《打草竿》、《劈擘玉》为诗，故足乐也”（《伯修》）。所作可谓“立意出新机，自治自陶铸”（《喜逢梅季豹》），亦可谓“务为新切”，“穷新极变”。“新切”之“新”，表现为诗歌抒发的感情、表达的生活感受新鲜、独特，不但能真实披露诗人解脱尘网、作为“大自在人”“快活无量”的心情，而且写得生动有味；既言人所未言，亦言人所不敢言，颇具个性色彩。“穷新”之“新”，主要表现为艺术形式、表现技巧的新奇，方法多为对旧形式作某些突破、构

建新的诗歌体式、“信腕信口，自成律度”，以及用语“宁今宁俗”而以“本色独造语”为贵。不足处在于情无所不写，景无所不收，缺少剪裁、提炼功夫，纵有妙句而短于谋篇；又抒情言怀直露无遗而鲜有回味之美，用语浅俗而难免“近平近俚近俳”。这些都显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长处和矫枉过正的毛病。

宏道《锦帆集》、《解脱集》中的尺牍、游记，可以说是他遵循“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原则，创作散文、特别是小品的代表作。江盈科说《锦帆集》中杂著“大端机自己出，思从底抽，摭景眼前，运精象外，取而读之，言言字字，无不欲飞，真令人手舞足蹈而不觉者”（《锦帆集序》），颇能道出宏道小品机锋、思致皆从自己胸臆流出，取眼前景、传神象外，语语飞动、鲜活的特点。宏道对江盈科说《解脱集》中游记，直谓“越行诸记，描写得甚好，谑语居十之七，庄语十之三，然无一字不真。把似如今作假事假文章人看，当极其嗔怪，若兄决定绝倒也”（《江进之》）。盈科《解脱集序》则谓“噫，甚矣，中郎言语妙天下也！夫近代文人纪游之作，无虑千数，大抵叙述山川、云水、庭榭、草木、古迹而已，若志乘然。中郎所叙佳山水，并其喜怒动静之性，无不描画如生。譬之写照，他人貌皮肤，君貌神情。若夫尺牍，一言一字，皆以所欲言信笔直尽，种种入妙。……中郎诸牍，多者数百言，少者数十言，总之自真情实境流出，与嵇、李下笔异世同符”。盈科说宏道尺牍如嵇康作书，“揭肺肝示人”，种种感受皆“自真情实境流出”，凡心中想说的话都直截了当地说尽，信笔写来，不受成法的约束，却妙趣横生，妙语如珠。游记则不单把“佳山水”作为记述的重点，而且能写出“其喜怒动静之性”，使之活灵活现。读盈科评语，加上宏道自己说的描写山水、表达感受“谑语十之七，庄语十之三，然无一字不真”，其尺牍、游记如何“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亦可想见。和写诗一样，宏道作尺牍、游记，也有有感即言、有见必写，而且言则“披露”“直尽”、写则“物无遁情”的特点。出语俚词谑语，屡见不鲜，谋篇偶尔也有写到哪里算哪里的情形。这应该是过于“不拘格套”出现的弊病。

总的来看，宏道诗文创作很少触及重大题材，表现的主要是个

人或圈子内少数人的文化生活及人生感受，虽是“无所不写”，内容仍然锁定在有限的范围之内。散文是一个综合性的文体概念，举凡古文、小品、笔记等都属于散文范畴。其中古文和小品区别很大，不单表现在篇幅的长短上，还表现在艺术精神的不同上。古文文体特征除有形者外，还必须具有以儒学为理论基础的艺术精神。小品则不一样，除篇幅短小、写法自由等形式方面的特征外，其艺术精神的理论取向变化多端，并不固定。可以说，宏道的性灵说正好为小品文艺术精神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宏道所写尺牍、游记及众多杂著皆从自己胸臆流出，也可以说他基本上放弃了古文写作。袁宏道提出性灵说，本来是为了矫正诗歌、古文写作中的拟古风气，结果却彻底否定了古文赖以安身立命的艺术精神，进而否定了古文本身。这是宏道始料未及的。古代散文发展中出现的从文以明道到独抒性灵的巨大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文体的消歇和另一种文体的勃兴，宏道的性灵说通过对主题、题材的大幅度转移，不单扩大了散文的表现范围，还有力地突出了散文表现个人生活尤其是闲适生活、日常事情的特征，带来了艺术精神的多元化。而信腕信口的话语方式和用语的“宁今宁俗”，更是大大促进了古代散文体式的解构、法度的解放和语言形式的更新，加快了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即古代散文向近现代散文转型的步伐，进步意义明显。但由于过于强调“独抒性灵”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即在散文写作中拒绝或搁置重大主题、题材和尽量弱化以至去掉明道说理、记述军国大事、关注公共话题、干预社会现实等诸多功能的嫌疑。

也有从中道的修正、调整入手来分析“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先天不足和末流之弊的，有从竟陵派的改弦更张、另辟蹊径入手来评价其长短得失的，还有从借鉴前人创作经验、理论建构的角度考察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之由来，从传播、接受角度评论其积极贡献以及负面影响的。不过这两方面的研究都还有待深入，如前者讨论前人创作经验的影响，对白居易诗歌创作“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着并包囊括入我诗内。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扩多少”（江盈科《雪涛诗评·评唐》），对刘禹锡《竹枝词》、《浪淘沙》一类民歌创作和用民歌风味、

民歌手法、民间语言创作绝句的做法，对苏轼“小文”、“小说”或“杂文”表现真我的艺术精神，“多韵”“善谑”“复参微言”（王纳谏《苏长公小品序》）、“短而隽异”（陈继儒《苏长公小品序》）、“随意断续”（袁宏道《瓶史》）以及“坡公作文如舞女走竿，如市儿弄丸，横心所出，腕无不受者……其至者如晴空鸟迹，如水面风痕”（袁宏道《识雪照澄卷末》）的特点，似乎还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因而说到白、刘、苏三家诗文创作经验对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观念形成的影响，就比较简单、抽象。从前人理论建构角度考察“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由来，也有类似的缺陷，如说宏道对唐宋派文论观思想要素的吸纳，即为显著的例子。至于从传播、接受角度评论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积极贡献和负面影响，论述较多的是20世纪30年代周氏兄弟和林语堂等人对公安派尤其是袁宏道的评价问题，所说结论似乎多半还停留在对当事人观点的复述上。而能从艺术精神、文体特征、审美导向、语言转型等层面来梳理这场论争的主要问题，以评论其对中国文学特别是散文发展所作的贡献和负面影响，确实少见。

凡研究晚明文学者，都不会否认这一历史时期有性灵文学思潮存在。通常研究这一文学思潮，多从考察其内容特点、表现形式、内外成因、演变过程、创作特色等方面入手，所写专著或专论多有精辟的论述和深刻的见解。晚明性灵文学思潮兴盛衰落的原因非常复杂，包括晚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文学、民风、民俗以及社会潮流、士人心态变化等重要因素。学者们于此多有论述，美中不足的是：很少有人能将诸多因素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并能准确找出其中一以贯之、可以称之为时代精神或社会发展大趋势的东西，因而对性灵文学思潮蕴含的人文精神、具有的时代特色、涉及的实际内容以及相关的审美范畴、文学学术语，少有精准的概括和诠释。又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既表现为思想家的呐喊和呼吁，也表现为文学流派、社团的形成和争论；既表现为文学理论方面的诉求，也表现为文学创作方面艺术精神和审美取向的确立；理论诉求既有概言“独抒性灵”者，亦有细道主“气”写“情”者；文学创作既见诸诗和散文，又见诸戏剧和小说；就是八

股文，亦有人将其纳入性灵说讨论范围或在写作中“抒写性灵”的。上述文学现象，每一项都可作一专论，事实上，其荦荦大者已被学者做过专题研究，并有相关论著问世。当然，有些现象尚未引起学者充分注意，或已经注意却研究不够。

戴红贤所著《袁宏道与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研究》，原是她的博士论文，后经几次修改，才得以出版。该书以袁宏道和晚明性灵文学思潮为研究对象，讨论的中心论题是性灵说。研究袁宏道，是围绕他“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展开的；论述晚明性灵文学思潮，则言及公安派、竟陵派主要成员的文论观、诗文特色及晚明诗歌、散文（特别是小品文）、戏剧、小说乃至八股文的新异之变。从全书内容安排和论述方式可以看出，戴红贤对学术界研究袁宏道和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的现状是比较清楚的，而且有意以前贤时修构筑的学术平台为起点，独立思考、取精用宏，以形成自有系统的学术观念。持论但求自得有见，说理力戒空言泛言，一方面大胆利用已有的学术成果、延续合理的思路、借鉴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同时又自出机杼，力争在内容拓展、理论阐释、体系构建、切入角度、材料挖掘以及言说方式等方面有新的突破。对前人未曾涉足或涉足不深的地方，要做探索式的考察和思考；对论断有误的成说、不合史实的误判，敢于说出自己的看法。应该承认，该书基本上实现了作者的写作愿望。具体说来，有下面几个特点：

一是学术视野开阔。作者研究袁宏道和晚明性灵文学思潮，不是就袁宏道论袁宏道，就晚明性灵文学思潮论晚明性灵文学思潮，而是由袁宏道到三袁到公安派到晚明性灵文学思潮，且将它们打成一片，通通置于晚明政治、经济、思想（包括传统儒学、程朱理学、阳明心学、释家诸宗之学）、文化（包括文学）、生产关系、社会心态剧烈变化的背景下，来考察其特性，确认其本质所在。如讨论袁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意义，上述学界用到的方法，几乎都为作者所用。不单能从多种角度切入，而且能借助西方人文科学观念、文学理论要义作切合实际的比较分析，所得结论和所用方法都使人有新异之感。

二是立论平实、稳妥。研究学问，尤其是作博士论文，做到这

一点不容易。有些学者过于“偏爱”研究对象，品评其人、称言其事，不乏拔高、溢美之词，或据事说理，往往好作大言宏论，有那么一点事实，即放大其说，耸人听闻；或根本就未弄懂，胡乱作论，不知所云。这种情况在戴著中并不存在。虽不敢说她完全做到了论自史出，但论理坚持实事求是、力求材料和观点的高度统一，出语注意分寸，却是她的特点。特别是在论述宏道文学革新思想的成因时，言及多种思想的影响，却说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

三是材料翔实，运用得当。这是作论文的基本要求，真要做到却不容易。戴红贤能做到这一点，固然与她有较好的文献学基础分不开，更重要的是对袁宏道和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的相关文献比较熟悉、理解比较透彻，因而运用起来得心应手，恰到好处。

以上三点既是该书的特点，亦为该书长处之所在。该书也有不足之处，最大的不足是上述学界研究袁宏道及晚明性灵文学思潮所存在的缺陷，该书并未完全避免；有时试图避免却很难避免，所谓“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表明作者学术功力还有待增强。其中最突出的，是进一步提高理论分析、概括能力，对作品艺术精神的认知能力和对诗文艺术美的感悟能力。戴红贤朴实好学，做学问有一股韧劲，凭着她的勤奋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学术上超越自我是指日可待的。近来，她正在编撰《公安派学术档案》，我相信通过编撰《档案》，她必将对袁宏道与晚明性灵文学思潮有更多更新更深的认识，而在学养、才识、思辨能力方面有跨越式的进步。如果她能在编撰《档案》之后再写一本全面研究公安派的专著，那就太好了。也许我这个希望，正好说出了读者的心声，红贤，红贤，能不勉乎哉！

熊礼汇

2012年10月27日

武昌南湖山庄梅荷苑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自然科学类编审委员会

- 主任委员** ▶ 李晓红
- 副主任委员** ▶ 卓仁禧 周创兵 蒋昌忠 李 斐
- 委员** ▶ (以姓氏笔画为序)
- 文习山 石 兢 宁津生 刘经南
 李文鑫 李晓红 李 斐 李德仁
 吴庆鸣 何克清 杨弘远 陈 化
 陈庆辉 卓仁禧 易 帆 周云峰
 周创兵 庞代文 谈广鸣 蒋昌忠
 樊明文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社会科学类编审委员会

- 主任委员** ▶ 李 健
- 副主任委员** ▶ 冯天瑜 骆郁廷 谢红星
- 委员** ▶ (以姓氏笔画为序)
- 丁俊萍 马费成 邓大松 冯天瑜
 李 健 汪信砚 沈壮海 陈庆辉
 陈传夫 尚永亮 罗以澄 罗国祥
 周茂荣 於可训 胡德坤 骆郁廷
 郭齐勇 顾海良 黄 进 曾令良
 谢红星 谭力文
- 秘书长** ▶ 陈庆辉



戴红贤（1968—），女，湖北监利人，武汉大学文学

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和语文教育研究。主持并参与了《袁宏道与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研究》

《20世纪公安派接受史研究》《近百年小学文言文教育研究》《大学语文教师发展模式研究》等省部级研究项目，已经发表《袁中道早期诗集〈南游稿〉〈小修诗〉考论》、《袁中道与钟惺断交时间和原因考论》、《三袁与李贽会晤时间及地点考辨》、《日臻纯熟的创作技巧，始终如一的性灵文学——袁宏道诗歌创作前后变化说探析》、《从重道德重实用到重性灵重自我表现——袁宗道文学思想论》、《袁宗道在公安派中作用和地位探析》以及《高校语文教育百年反思及新世纪课程建设探寻》、《论大学语文教师的学者化问题》、《周作人与民国早期小学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化”》（合著）、《刘向书与中国前小说的形态特征》等论文，出版了《墨子译注》、《尚书译注》（合作）、《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文献导读》等著作。

目 录

绪 论	1
-----	---

上编 袁宏道的性灵说

第一章 袁宏道性灵说兴起的时代背景	11
第一节 万历时期政治与社会	11
第二节 道学革新运动与性灵思想	22
第三节 文学复古运动与性灵文学思潮	38
第二章 根除习气,一灵真性的人学思想	75
第一节 “一灵真性”的人性论	75
第二节 打破格套,根除习气的心性修养论	92
第三节 “最天下不紧要人”的闲适人生观	104
第三章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思想	120
第一节 真与变:性灵诗文批评	120
第二节 质与韵:性灵主体精神内涵	137